

# 国际传播的特点及其对传播效果的影响

——以《纽约时报》为例

李 敏

**摘 要:**新闻采编的选择性和新闻话语的建构性使整个传播过程都伴随着意识形态的运作,这使得国际传播的效果与媒介对新闻的客观性追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使国际传播呈现出种种悖论,在再现客观世界的同时建构出一个符号的世界,而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则体现出国际传播话语强大的包容力和可塑性。

**关键词:**建构性;客观性;意识形态;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传播媒介在沟通各民族文化、传递各国信息、增强不同种族间的认知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反映和影响国际社会格局的重要因素。在新闻类信息的生产过程中,西方媒介的“客观性法则”已经成为大部分国家的媒介共同认可的理念,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这一理念却因各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对新闻事件的选择性地呈现以及媒介生存需要等原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本文试以《纽约时报》为例分析国际传播的特征,探察潜藏在“客观性”之下的国际新闻特质及其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

《纽约时报》被称为“历史记录式的报纸”,由于能够不惜篇幅地充分报道新闻事件尤其是重大新闻事件,以及完整无缺地刊登重要文献而成为代表美国主流社会和精英阶层的最具影响力的精英报纸之一。国际新闻报导一直被认为是《纽约时报》最强的一部分,《时报》自己也声称“国际报道是本报的基础”<sup>①</sup>,并被国际社会视为全世界国际新闻版面最多

的权威性报纸。与此同时,该报一贯主张客观公正地报道,并因其严肃稳重的风格被称为“灰色贵妇”,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国际传播格局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媒介的特征。

## 一、客观性:新闻不可企及的神话

在近150年历史中,《纽约时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罢工以及多次的家族危机,至今仍旧能够保持高度影响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客观严谨的报道态度。为了保证客观性,该报采用了多种举措,譬如:区分观点与事实,最常见的是记者在写作过程中不表态,但常常引用被访者的评论作结尾,使报道看上去更真实可信没有偏见;尽可能地搜集资料并延伸报道,追溯事件来龙去脉,提供历史背景,从更多侧面呈现新闻事件,使得新闻报道表现出一种忠于历史的“记录”的精神;在观点表达和题材选择上保证报道的平衡,比如在评论版上提供多元的意见。依照该报的说法,评论版存在着800

**作者简介:**李敏,河北大学讲师,博士。

<sup>①</sup>埃德温·戴蒙德,《〈纽约时报〉——从美国权威大报看新闻处理现场》,第219页。

种声音<sup>①</sup>,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些有趣、合理而不荒谬的看法,最重要的是,要为消费者提供不同的声音,因为是不同的,所以也不代表我们编辑部同意所有的声音”,<sup>②</sup>此外,引语的使用、交代信息源、倒金字塔结构等一些具体的写作技巧也有助于凸显新闻的客观性。本文的分析也显示出《时报》关于女性人物的报道在议题选择、人物行为描写、标签语言方面流露出对客观性的追求,这种客观性赋予报道真实性和权威性的品质。

不过,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也颇受质疑,尽管媒介一直致力于进行客观真实的报道,但这种追求似乎是永无止境的,“真实客观”的理念更近似于一个乌托邦。这一点连一向奉真实为圭臬的《纽约时报》也不能幸免。吉特林在研究《纽约时报》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的报道时发现,《纽约时报》在1965年对新左派运动的报道并非始终如一,也并非完全客观,其模式不断发生着变化。起初是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表现出尊敬的姿态,后来则逐渐将其视为浅薄的政治运动,并且进行诋毁;到了当年秋天,批评这场运动已经成为报道的主流,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被其视为极端、异常且危险的政治组织。<sup>③</sup>在报道1965年4月17日发生的华盛顿反战示威游行时,报纸的报道“既包含了严肃的一面,又包含了肤浅的一面”,文章把示威游行写得“非常无聊”,把学生运动视为“异想天开的行动”,并且选取的照片显示出“反战示威与右翼力量大体上势均力敌”的意象。<sup>④</sup>《时报》不断变换的立场使人们不得反思客观性是否真正是“不死之神”?<sup>⑤</sup>事实的面目究竟如何?

新闻事件的不可预测性、编辑部内部及其与政治经济势力的各种合作、争斗、记者编辑们的个人喜好等都会成为影响新闻客观性的重要因素。有时候,

记者成名立万的个人野心也会给新闻的真实客观造成致命的打击。比如,曾经在《纽约时报》就职的记者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在该报发表的73篇文章中有36篇是捏造或抄袭的。2003年5月11日,《纽约时报》自报家丑,用四个版的篇幅描述了此事。此事甫一披露,就给《纽约时报》造成极大的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客观性的可望不可及时将媒介推入尴尬的境地。尤其是对异质文化和其他国家进行报道时,西方媒介往往被指责对报道对象“贴标签”,并在报道中充斥“刻板印象”。萨义德在分析美国媒介对中东的报道时特别提出,美国记者在报道中东事件时常常不懂中东的语言,他们的报道常常带有种族优越感,并成为“陈词滥调和狭隘的利己主义”<sup>⑥</sup>,另外,“人群、组织以及事件的解读往往以能否直接满足美国的利益为标准。”<sup>⑦</sup>从这一角度看,客观性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能够赋予新闻话语相当大的包容性,使媒介将主观观念融入新闻报道,正因为有“客观性”这杆大旗,西方媒介才能够名正言顺地延续一贯的报道路径。

一些学者注意到客观性的这一效果并指责西方媒介对第三世界的报道充满了偏激和刻板印象,但西方很多媒介从业者却极力否认这一点。《纽约时报》对中国报道的态度也表明西方媒介的这种固执。《时报》驻上海机构的主管赛斯·费逊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曾经召开过的关于如何改善美国媒体中国报道的研讨会表示,美国媒体不会改变报道中国的框架路径,因为它理应如此。<sup>⑧</sup>虽然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媒体存在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但只有少数人认同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关于中国的报道即使不够正面,也足够公正。”<sup>⑨</sup>

实际上,无论媒体在国内被认为属于哪个派别,

① 朱桂英等,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新京报》,2011年9月10日,C02版。

② 朱桂英等,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新京报》,2011年9月10日,C02版。

③ 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张锐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④ 同上,第24页。

⑤ 罗伯特·哈克特(R.Hackett)与赵月枝在论及客观性时以“不死之神”来比喻客观性,参阅《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合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 Said, Edward.Covering Isla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7, p. 107

⑦ Brain Michael Gos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Welfare of the Iraqi People”: The Sanctions Regime against Iraq in the New York Times(1996-98).University of Saint Louis, Madrid Campus, Spain. Journalism Studies, Volume 3, Number 1, 2002, pp. 83-99.

⑧ 美报批判传媒对华报道不负责任,《参考消息》,2000年3月1日。

⑨ 凯丽·丹博(Kerry Dumbaugh),《“国会”:双边关系的新变数》,见:《无形的手:与美国专家点评中美关系》,郝雨凡,张燕东编,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403页

在报道国际事务时都会呈现出强硬的立场,尤其是对他国持有偏见的时候,这种强硬的态度会更加明显。而这种态度的后果就是“让国家领导人夸大敌对国家的邪恶企图,误判敌人的自我评价,当敌意出现后过分乐观,在谈判时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让步。”<sup>①</sup>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时报》在第二次海湾报道中实际上发挥了支持小布什发动战争的作用,以及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报道中总是充满忧虑和敌意、对中国的人权报道总是采取指责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除去负面报道和一些带有偏见的论述,一些持积极态度的文章产生的效果也未必是完全正面的。譬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后,《纽约时报》于8月27日刊发了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七年》。弗里德曼在文中盛赞中国发展迅速,称中国“无可匹敌”。尽管文章赞许了中国的巨大成就,但以西方视角看这篇文章却可能产生“中国对西方造成威胁”的感受。这篇文章在中国媒体中转载时标题被改为《与中国比,美国是第三世界国家》,更加突出了“中国威胁论”的意味。

## 二、建构性:国际传播话语的本质特征

早期传播效果理论认为媒介能够完全客观地呈现社会现实,并将其作为衡量新闻优劣的标准。1922年,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论”为人们理解传媒的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李普曼认为媒介并非镜子式地反应现实,而是通过对事实的选择和加工建构起“拟态环境”。由于是媒介选择和建构的结果,这一环境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真实。

实际上,真实与客观是一种价值判断。依照福柯的观点,新闻可以视为一种“知识”,新闻的产制实际上就是作为“知识”的新闻文本在社会中形成的过程。既然“知识”是思维的产物,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那么新闻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思维的主观色彩。正如张锦华所说,“人类社会中的‘知识’在经验上的多样性,也扩及任何‘知识’体系是如何由社会建构一种‘现实’的各种过程”。<sup>②</sup>也就是说,人们基于不同的经验和文化背景给予“知识”不同的理解,因而“知识”是被建构的;人们通过各种“知识”认识世界,因而各种知识系统都是对客观现实“建构”的结果。在这一认识论框架中,所谓的“新闻事件”就是在采访路线框架下‘再现’的事实<sup>③</sup>,而这种再现的结果表现为两个层面<sup>④</sup>,即“符号社会真实”(symbolic social reality)和“主观社会真实”(subjective social reality)。这两个层面的真实均是含有主观倾向的、选择性认知和书写的结果。新闻话语选择特定的符号、叙事方式、议题设置呈现现实,使媒介文本不再是完整反应社会现实的镜子,而是有意识地过滤之后的迷思,新闻的最终效果就表现为建构、创造另一种现实,即主观社会真实。因此新闻文本具有建构性,其效果是“涉及种族、性别、国别以及阶级类目下种种对他者的迷思,透过媒介文本的再现,使得历史充分被自然化。”<sup>⑤</sup>这种再现的机制往往能够强化刻板印象。譬如,《纽约时报》对重庆涉黑团伙成员谢才萍的报道可作为国际传播话语建构性的极端表现的案例。该报对谢才萍做了如下描述:

Xie Caiping, known as “the godmother of the

① Daniel Kahnemart, Jonathan Renshon, Why Hawks Win,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7, pp34-38, 转引自陈静,《媒介偏见的社会文化根源与控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② 杨芷茜,《移住家庭监护工的媒体再现:以台湾报纸对“刘侠事件”与“冯沪祥事件之报导为例》,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2006年。

③ 张锦华,《媒介文化、意识形态与女性》,第24页。

④ 汉纳·阿多尼(Hanna Adoni)和阿海瑞尔·曼恩(Aherrill Mane)认为人类拥有具体化与客观化个体内在及主观的意义、经验、行动能力,所以人类是社会的产物,社会也是人类的产物,顺着这一思路,阿多尼和曼恩将真实(reality)区分为三个面向。首先是“客观社会真实”(objective social reality),指存在于个体之外的客观世界,这个层面人们运用常识就能够理解,毋需进一步确证其存在。虽然人们具备怀疑这类真实的能力,但为确保自身存在及与他人互动的日常生活得以顺利进?,人们往往特地回避此种能力。其次的“符号社会真实”(symbolic social reality),包括了客观真实的各种符号表现形式,例如艺术、文学、媒体内容等。各式各样的符号系统建构了有多重差异的符号真实。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体感知各种符号真实和在其间区辨组成多重真实之对象的能力。第三是“主观社会真实”(subjective social reality)。客观真实和符号真实的输入,都会影响到个体主观真实的建构,甚至型塑个体的意识。因此主观真实提供个体社会行动的基础,也同时确保了客观真实的存在和符号表现的意义。参阅杨芷茜,《移住家庭监护工的媒体再现:以台湾报纸对“刘侠事件”与“冯沪祥事件之报导为例》,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2006年。

⑤ 倪炎元,再现的政治:解读媒介对他者负面的策,《新闻学研究》,1999年,(总)第58期。

Chongqing underworld.” Prosecutors say she ran 30 illegal casinos, including one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courthouse. She also employed 16 young men who, according to the state-run press, were exceedingly handsome and obliging.<sup>①</sup>

(谢才萍被称为“重庆黑社会的教母”。她经营着30个非法赌场,其中一家还在法院对过。据一个官方记者说,她还雇用了16个体贴温顺的帅男。)

“谢才萍雇佣帅男”的说法是《时报》引用的国内一些“官方记者”(according to the state-run press)的。这个叙事突出了谢才萍的违规行为,即她不仅违反了法律规定,还颠覆了传统性别秩序的规定性。不过,这个来自于“官方记者”的说法最后被证实是假消息。《时报》这篇文章对信源的引用并没有客观反映现实,而是捏造了事实,塑造出一个完全不受中国文化和法律制度认可的女性“违规者”形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传播中的选择性操作对再现异国或异族形象的影响。在国际传播中,由于受众很少有机会亲自接触国外的事务人物,传播的建构性效果就更加明显。

### 三、意识形态:国际传播的过滤器

新闻话语的建构功能决定了新闻文本的生产过程就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一般来说,对意识形态的界定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种认为意识形态就是所有人的思想,是一种“研究思想”的科学,如同自然科学能够解密大自然的神秘一样,意识形态能促进社会免除非理性的偏见。<sup>②</sup>这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看法实际上将其视为理解社会的思维方式。另一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即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隐藏了阶级、性别、种族之间的倾轧、剥削以及不平等,其后果是维护社会既定的组织方式,赋予现有社会模式合理性。<sup>③</sup>这种观点认为,意识形

态代表主控阶级及优势集团的思想主张,是一种具有社会地位功能的思想。由于马克思将权力与思想相连结,因此尽管他本人并未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他的这一主张却影响到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知,后来者经常以其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新闻文本分析中使用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指第二种具有批判色彩的概念。

西方媒体自冷战开始就延续着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在分析美国媒体报道机制时,赫曼和乔姆斯基曾提出“反共过滤器”的概念,以揭示西方媒体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他们认为,“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红色恐慌’(Red Scare)时期,议题总是倾向于根据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二元化世界(a dichotomized world of Communist and anti-Communist powers)来框架,将得失给予竞争的双方,但支持‘我们的一方’被视为一个完全合法的新闻实践……反共这一意识形态和宗教是一个重要的过滤层。”<sup>④</sup>对这一倾向吉特林表示,“它深深陷入了传统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以及霸权主义界定事件的方式之中”。<sup>⑤</sup>

《纽约时报》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意识形态偏见,这在对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执政方针的表述中尤其明显。德国作家甘特尔将西方媒介对中国的这种偏见称为“对中国的歇斯底里症”。<sup>⑥</sup>再比如,在报道1965年美国国内爆发的反战运动时,《纽约时报》起初也对运动给予关注和同情,却也不敢显得过于同情共产主义。曾经担任该记者的劳伦斯·本斯基(Lawrence M. Bensky)曾经表示说,当年在报道反战运动时,编辑们极力避免流露出同情共产主义的倾向,以防被国内右翼势力抓住把柄。在对1967年反越战游行的报道中,《时报》也极力避免过于同情左派运动。当时《时报》的发行人小苏兹贝格拥有着“对共产主义的个人憎恶”,这也从

① Chinese Trial Reveals Vast Web of Corruptio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 2009.

② 曼海姆和麦克拉伦都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区分。曼海姆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区分意识形态,一种是完整而全面的思想,即所有人的观念,一种是特殊的用法,即具有社会地位功能的思想;麦克莱伦认为一方面可以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理解社会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另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即与科学思想无关,而是与权力宰制相连。参阅,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概念的两种含义》,林建成编译,《洛阳师专学报》,1999年12月,第18卷第6期。David McLellan, Ideolog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6, p.99., 转引自, JOURNAL OF FILM AND VIDEO, Fall 1988.

③ Keller, D. Ideology, Marxism and advanced capitalism. Socialist Review, 1978, pp.37-65, 转引自黄靖惠《对美国<时代>台湾政党轮替报导的批判论述分析:以2000年及2008年总统选举为例》,《新闻学研究》,2011年1月,(总)第一〇六期。

④ Herman, E. & Chomsky, N.() Manufacturing Consent: A Propaganda Model, Pantheon Books. 1998, pp 30-31.

⑤ 《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托德·吉特林著,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

⑥ 埃德温·戴蒙德,《〈纽约时报〉——从美国权威大报看新闻处理现场》,第219页。

一个侧面证明了这张主流大报同大部分白人中产阶级一样对共产主义存有异议。该报还曾经在 1955 年解雇了三名记者,这三名记者都是共产党员。<sup>①</sup>

在更宏观的角度上看,国际传播中的意识形态还体现为对非美式政治制度的敌意。以《纽约时报》为例,它在国内被认为具有左派色彩的报纸,但一些学者也提出,所谓的“左派”立场只是表象,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时报》还是会追随政府左右。它判断报道对象是否是美国“自己人”的标准一是看是否与美国政治制度相仿,二是看是否符合美国利益。《时报》对伊拉克和印度报道的不同态度即为例证。霍华德·弗里尔(Howard Freyre)在《一纸瞒天》中分析了《纽约时报》关于海湾战争的文章,他认为,《时报》表面采用平衡客观的策略报道海湾战争,实际上是在支持小布什总统发动战争。曾任《纽约时报》记者的斯考特在接受《新京报》记者访问时也提到这种平衡策略:“平衡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报纸的平衡,所以我们也选择了一些为政府辩护的文章。另一个是更大背景下的平衡。当时白宫的声音已经非常普遍了,哪怕没有我们,在哪儿都能听到白宫的声音,我们不想重复别人说过的,我们希望给出另一种平衡,让读者听到其他地方听不到的声音,所以我们最后看起来更像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sup>②</sup>因此,“左派”立场有时候看起来只是报纸用以保证报道平衡并吸引更多的受众的一种策略。更为关键的是,政治立场有可能直接关系到媒体的生死存亡,在涉及到美国国家利益和政治制度的时候,媒介基本上都会与政府保持一致,在日常报道中也总会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来回游走,使报纸的存活获得更大余地。

## 结语

公正与平衡(fair and balanced)一直是美国及其他西方新闻业界的行规,传播者们也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标准化或规范化的操作模式,包括精巧的话语设计,表现为抒情性语言、形容词和评价性语言的压缩,对事实的描写和动词使用的增加,以及相对固定的叙事结构(主要表现为倒金字塔结构)等。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正是这些话语设计、特定的叙

事结构和文法结构赋予文本更大的空间以隐藏其主观倾向。因此,客观性将依旧是媒介不断追求的目标,话语的建构性、对不同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偏见也将继续存在,媒介依旧会努力在这三者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而国际传播就是这些特质相互牵制、妥协的结果。

## 参考文献

- [1] 兰杰:《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折射出的意识形态[J],《新疆大学学报》,2011,3.
- [2] 倪炎元:再现的政治:解读媒介对他者负面建构的策略[J],《新闻学研究》,1999,(58).
- [3] 吴卫华,镇涛:意识形态话语的隐形书写:好莱坞电影的黄白性恋模式 [J],《长春文艺争鸣》,2007,(11).
- [4] 杨雪燕,张娟:90年代美国大报上的中国形象[J],《外交学院学报》,2003,(5).
- [5] 周宁:跨文化形象学: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三组问题[J],《厦门大学学报》,2008,(6).
- [6] 林傲如:《美国媒体对“特殊国与国关系论”报导之内容分析与立场倾向研究——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为例》[A],台大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
- [7] 严怡宁:国家利益视角下的美国涉华舆论 [A].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
- [8] Daniel Riffe, Charles F. Aust, Ted C. Jones, Barbara Shoemke and Shyam Sundar. The shrinking foreign news hole of the New York Times,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J], Summer(1994).
- [9] Antonio V. Menendez Alarcon,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Eru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J].4(2010).
- [10] Bonnie Brennen and Margaret Duffy, “If a problem cannot be solved, enlarge It”: an ide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Other” in Pearl Harbor and September 11 New York Times coverage, Journalism Studies [J]. 4(2003).

① 1955年,美国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就美国媒体中的共产主义举行了听证会。当时的参议员詹姆斯·伊斯兰特(James Eastland)召集了38名证人,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25人,其中有6人承认是共产党员。在这次调查后,《时报》又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查,调查了所有被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店名的人,最后以“合作不善”为由解雇了三个人。参阅,《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托德·吉特林著,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② 朱桂英等,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新京报》,2011年9月10日,C02版。